

农民工消费潜力估计

——以城市居民为参照系

王美艳

内容提要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必须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释放农民工的潜在消费需求,是扩大消费的一条重要途径。本文利用2010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描述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与消费模式,考察了两个群体的消费弹性和边际消费倾向。研究表明,如果农民工转换为城市居民身份,按照城市居民的消费模式进行消费,但其禀赋特征保持不变,其人均总消费将大幅度增长27%,与城市居民消费水平基本相当。如果将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养老保险覆盖水平和受教育水平等禀赋特征不断改善一并考虑在内,农民工的消费潜力将更大。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步伐,是挖掘农民工消费潜力的关键。

关键词 农民工 市民化 消费潜力

DOI:10.16304/j.cnki.11-3952/f.2016.02.001

一、引言

大多数经济学家和观察家认识到,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进入一个新的经济增长阶段,即所谓的“新常态”。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和居民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均呈现显著的下降趋势,2013年分别仅为49.8%和36.2%。^①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一些发达国家,例如美国和日本,这

两个比重均呈现显著的提高态势而且远高于中国。2013年,美国的这两个比重分别为83%和68%,日本分别为82%和61%。^②

中国扩大消费需求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任重道远。就目前中国整体经济状况而言,扩大消费需求的目标能够通过多种途径达到。其中,释放农民工的潜在消费需求是一条重要途径,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农民工工资上涨迅速,农民工规模持续扩大,其收入从总量看已经是一个相当大的数额,产生巨大的潜在消费需求。近年来,农民工工资呈现持续的上涨态势(蔡昉和都阳,2011;李实,2013)。与此同时,随着户籍制度和城市一系列福利制度的改革,进入城镇就业的农民工不断增多,农民工规模持续扩大。2013年,外出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外出农民工数量达到1.66亿,平均工资为2609元(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14)。据此推算,外出农民工的工资总额超过4331亿元,其潜在消费需求可以预见。

其次,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其边际消费倾向显著高于上一代农民工。由此,即使农民工的收入水平维持不变,其消费水平也会随着其中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扩大而逐步提高。2013年,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为12528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46.6%(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14)。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年人均生活消费比上一代农民工多858元,其边际消费倾向显著高于上一代农民工(王美艳,2013)。另有研究发现,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消费倾向更高

（“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2011）。新生代农民工这个逐渐庞大起来的群体，加上其较高的消费倾向，进一步提高了农民工的潜在消费水平。

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潜在的新兴消费群体，对扩大中国的消费需求和推动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由于不具有真正的城市居民身份，农民工就业通常更不稳定，更容易遭受周期性失业的冲击。^③ 其收入通常更低，所享受的社会保障和社会保护更少^④，而且不能均等地享受义务教育和保障性住房等方面的公共服务（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10；樊纲等，2013）。根据消费决定理论，收入是影响消费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因素，收入较低消费通常也会较低。与此同时，就业稳定状况以及所享受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状况，对消费水平和消费模式也有重要影响。^⑤ 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工就业相对不稳定，收入更低，社会保障和社会保护缺失，必定严重抑制他们的消费意愿。

基于此，尽管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但是，其消费行为特征与城市居民完全不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0；樊纲等，2013）。对农民工而言，如果就业稳定性提高，收入增加，被更多的社会保障和社会保护覆盖，享受到更均等的公共服务，就会对未来具有更加稳定和乐观的预期并进而提高消费。更进一步，如果能够完全实现市民化，获得正式的市民身份，农民工的消费意愿就会相应改变，并提高消费水平，改变消费模式（蔡昉，2011）。

农民工实现市民化后的消费潜力，由此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要问题。显然，考察这一问题，只有以城市居民为参照系，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进行对比分析才可能完成。相应地，进行这类研究所使用的数据需要同时包含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两个群体。已有大多数对农民工消费进行的研究存在的共同问题是，所使用的数据仅仅包括农民工，而不包括城市居民（例如粟娟和

孔祥利，2012；曹广忠、李凯和刘涛，2012）。仅有少数研究（例如 Song、Wu 和 Zhang，2010；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0）使用的调查数据中既包含农民工，又包含城市居民，但这些研究各自存在不同的问题。^⑥

本研究将使用2010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对农民工的消费潜力进行考察。该数据在所调查的每个城市，分别抽取农民工家庭和城市居民家庭进行调查，所使用的抽样方法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样本的代表性。^⑦ 研究将以城市居民为参照系，对农民工的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进行描述，以更加清晰地展示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相对状况。研究将分析两个群体的消费弹性和边际消费倾向，并预测如果农民工实现市民化，其消费水平和消费模式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消费潜力将有多大。农民工消费潜力预测的基本假定是，农民工实现市民化后，其消费将按照城市居民的消费模式进行。

本研究以下部分是这样组织的：第二部分对文献进行总结和述评；第三部分对研究使用的数据进行详细介绍，并以城市居民为参照系，分析农民工的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第四部分分析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估计和比较两个群体的消费弹性和边际消费倾向；第五部分考察如果农民工实现完全的市民化，其消费水平和消费模式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消费潜力将会如何；第六部分给出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文献总结与述评

有关农民工消费的研究，其中一些对农民工为什么具有消费潜力进行了解析，并探讨了挖掘农民工消费潜力的制度手段。蔡昉（2011）指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增加了农民家庭的收入，有利于形成新的消费者群体。但是，由于不完全的城市化，没有实现农民工户籍身份

的转换,从而也未能把农民工纳入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使得农民工尚未成为足够大的消费群体。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和包括户籍制度改革在内的相应制度变革,有助于挖掘农民工的消费潜力。

已有大多数使用微观调查数据对农民工消费进行的研究,所使用的调查数据仅仅包括农民工,而不包括城市居民。基于此类数据,仅能对农民工的消费状况进行描述,考察农民工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孔祥利和粟娟(2013)利用全国28省区1860份农民工消费调查数据,讨论了农民工消费的影响因素,指出农民工消费受经济、社会以及个人三维条件的约束。粟娟和孔祥利(2012)分析了农民工的消费结构特征及市民化趋势。研究指出,农民工的食物、服装、子女教育以及人情开支消费需求弹性比市民大;教育与娱乐消费份额偏低;医疗消费与住房消费特点与市民相似,消费倾向小,但住房支出的价格弹性大。

曹广忠、李凯和刘涛(2012)基于12个城市的抽样调查数据,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的层次特征、城乡差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研究发现,农民工家庭消费中生存消费仍占有绝对比重,高层级消费尤其是发展消费处于抑制状态;未来倾向于定居城市的家庭的消费结构层次明显高于未来打算返回老家的家庭;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确实可以带动农民工家庭在地位消费和享受消费上的支出,但对发展消费带动有限甚至有负面影响。

少数研究使用的数据同时包含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两个群体,这为讨论农民工实现市民化的消费潜力提供了可能,但这些研究尚存在一些局限。例如,Song、Wu和Zhang(2010)使用的调查数据中同时包括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两个群体,而且对两个群体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工的边际消费倾向更低,农民工消费需求的收入弹性还不到城市居民的一半。研究指

出,如果采取切实措施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农民工的潜在消费需求就可以得到很大程度的释放。

该研究通过消费与收入的简单回归,估计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消费弹性与边际消费倾向。研究从一般均衡的视角,揭示了农民工市民化与扩大内需的关系。我们知道,消费除了受收入的影响外,还受到一系列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社会保障覆盖状况、家庭规模和受教育水平等,但是,该研究未对这些因素进行控制。与此同时,该研究也没有对农民工市民化的消费潜力进行预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0)运用CGE模型,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对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显示,农民工市民化可以促进居民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降低经济增长对进出口的依赖程度。市民化还可以改善农民工的消费结构,增加农民工对工业产品和服务业的需求。加快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有序将农民工纳入城镇居民保障体系,真正实现无差异市民身份,将会释放出强大的内需增长潜力。然而,该研究使用的是汇总数据,无法将影响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消费的微观特征考虑在内。而且,应用CGE模型进行预测需要基于若干假设才能进行,这些预设条件可能与现实差距较大。

三、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

本部分首先对研究使用的数据的基本情况介绍,描述数据的抽样方法和数据中包含的基本信息,对该数据进行本研究的优势进行讨论。接下来,本部分以城市居民为参照系,分析农民工的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

(一)数据基本情况与数据优势

本研究将使用的是2009年底到2010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在上

海、武汉、沈阳、福州、西安和广州六个城市进行的劳动力调查(以下简称2010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该调查在每个城市根据分阶段随机抽样原则,抽取了700户城市居民家庭,填写了家庭情况问卷和所有家庭成员问卷。在每个城市,调查同样按照分阶段随机抽样原则,还抽取了600户外来人口家庭,填写了家庭情况问卷和所有家庭成员问卷。调查中所包括的外来人口,有的为农业户口,有的为非农业户口。本研究只分析其中具有农业户口的外来人口,或称农民工。

本调查中包含的信息,可以归结为两类:一类是家庭中每个成员的个体信息,一类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信息。家庭中每个成员的个体信息,包括家庭成员的基本状况、人力资本特征、就业、收入和社会保障等状况。以家庭为单位的信息,包括家庭住房状况、以家庭为单位的收入和消费等状况。由于一些住户的某些信息缺失,本研究最终使用的数据包括4148个城市居民家庭和2428个农民工家庭。

使用这项数据主要有两点优势:第一,每个城市的调查既包括城市居民,又包括农民工,便于对两个群体的消费水平与消费模式进行更具有可比性的分析,并为以城市居民为参照系预测农民工的消费潜力提供了可能;第二,对于本研究的目的而言,该调查数据的最大优势是,数据中包含详尽的有关消费、收入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信息,为考察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条件。

本研究着重关注的消费状况,在调查数据中非常翔实。在国家统计局城镇住户调查中,家庭消费包括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及其他商品和服务共八类。本研究使用的2010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较为完整地包含了这些类别的消费信息,而且其统计方法与国家统计局城镇住户调查非常类似,这也为检验本研究所用数据的质量创造了条件。

(二)农民工消费的描述性分析——与城市居民比较

度量消费时通常将消费区分为两种类别:具有明确可分性的消费和不具有明确可分性的消费。前者是指可以用以个人为单位的数据反映的消费,例如医疗和教育消费。每个人的门诊和住院等医疗费用,是很容易统计出来的;每个人的学杂费和书本费等教育费用,也比较容易统计出来。后者是指消费在家庭成员之间不容易区分,只能用以家庭为单位的数据反映,例如食品消费。家庭成员通常在一起进餐,食品消费往往难以以个人为单位进行统计,而只能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统计。

2010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涉及的消费类别,包括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及其他商品和服务。其中,医疗保健消费和教育消费是以个人为单位统计的,其他类型的消费是以家庭为单位统计的。在考察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消费状况时,首先需要将以个人为单位统计的消费与以家庭为单位统计的消费,加总到家庭水平,然后再计算人均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等指标。

为了检验2010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的质量,尤其是其中与消费相关数据的质量,我们将根据该调查计算的城市居民年人均消费,与国家统计局城镇住户调查显示的城镇居民年人均消费进行了比较(表1)。从年人均总消费看,两个调查的数据基本相当。从分项消费看,前者的食品消费高于后者;医疗保健消费、交通和通信消费及其他商品和服务消费两者基本相当;其余消费类型均为前者低于后者。

2010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是在上海、武汉、沈阳、福州、西安和广州六个大城市进行的。其中上海、沈阳、福州和广州位于东部地区,武汉和西安分别位于中部和西部。因此,根据这些城市的调查数据计算出来的消费水平高于全国

表1 与国家统计局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的比较

消费类别(元/人/年)	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 城市居民消费(A)	国家统计局城镇住户调查 城镇居民消费(B)	两者差距(A)-(B)
食品	5416	4479	937
衣着	1050	1284	-234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398	787	-389
医疗保健	812	856	-44
交通和通信	1698	1683	15
教育文化娱乐服务	1240	1473	-233
其他商品和服务	490	474	16
总消费	11104	11036	68

注:2010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中的居住消费统计口径与国家统计局城镇住户调查存在较大差异,居住消费将不纳入本研究分析中。2010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中的医疗保健消费只涵盖自费部分,未包括报销部分;国家统计局城镇住户调查中的医疗保健消费既涵盖自费部分,也包括报销部分。考虑到对医疗保健消费自费部分的分析也有意义,医疗保健消费将纳入本研究分析中。2010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中的其余所有消费类别的统计口径与国家统计局城镇住户调查完全一致。

资料来源:2010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城市居民消费数据根据该调查数据计算得到,2010年国家统计局城镇住户调查城镇居民消费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0)》

城镇居民平均水平,应该是合理的结果。然而,表1数据表明,两个调查显示的消费水平基本相当。这意味着,2010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收集的消费数据可能存在略微偏低的问题。鉴于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考察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消费的相对关系,这个问题的存在不会影响分析结论。

该问题产生的可能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国家统计局城镇住户调查的消费数据是通过记账方法收集的,2010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是一次性调查,消费数据是被调查对象通过回忆填写的。经验表明,与记账方法相比,一次性调查收集的消费数据通常略微偏低。第二,2010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中的医疗保健消费只涵盖自费部分,未包括报销部分;国家统计局城镇住户调查中的医疗保健消费既涵盖自费部分,也包括报销部分。由此造成2010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的医疗保健消费偏低。

以下使用2010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对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与消费结

构进行分析。为简明起见,本研究将表1中的七类消费进行合并:将衣着消费、交通和通信消费及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合并为与工作相关消费,将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其他商品和服务合并为设备用品和服务消费,将医疗保健消费和教育消费合并为资本消费。这样,总消费被划分为四大类:食品消费、与工作相关消费、设备用品和服务消费以及资本消费。

农民工的年人均总消费为8627元,城市居民为11104元,农民工消费比城市居民低2477元(低22%)。分类观察发现,两个群体的设备用品和服务消费、资本消费差距较大,农民工分别比城市居民低出37.6%和47.9%;食品消费、与工作相关消费差距较小,农民工分别比城市居民低出14.7%和19.6%(表2)。

不论农民工还是城市居民,均为食品消费在总消费中所占比重最高,在50%左右;接下来为与工作相关消费,其他类别消费所占比重较低(表3)。与此同时,与工作相关消费所占比重、设备用品和服务消费所占比重对两个群体而言

表2 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年人均消费

消费类别	农民工(1)(元)	城市居民(2)(元)	(1)-(2)(元)	$[(1)-(2)]/(2)*100(\%)$
食品消费	4620	5416	-796	-14.7
与工作相关消费	2707	3367	-660	-19.6
设备用品和服务消费	554	888	-334	-37.6
人力资本消费	747	1433	-686	-47.9
总消费	8627	11104	-2477	-22.3

资料来源:根据2010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均基本相当。但是,农民工食品消费所占比重比城市居民高出4.8个百分点,人力资本消费所占比重则比城市居民低4.2个百分点。

不论农民工还是城市居民,均为食品消费和与工作相关消费占可支配收入比例较高,分别在25%和15%左右(表4)。设备用品和服务消费及人力资本消费仅占可支配收入的较小比例。农民工年人均总消费占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例为44.1%^⑧,城市居民为52.9%,前者比后者低8.8个百分点。分类观察发现,每项消费占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例,农民工均低于城市居民,但低

出的幅度不大。

以上分析揭示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方面的异同。然而,仅仅通过这些描述性信息,尚无法清晰地识别两个群体的消费状况究竟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这是因为,一个家庭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受到家庭收入水平、家庭成员社会保障覆盖状况、家庭规模、家庭人口结构、户主性别、年龄和受教育水平等若干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需要使用计量模型,对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表3 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消费结构

消费类别	农民工(1)(%)	城市居民(2)(%)	(1)-(2)(%)
食品消费	53.6	48.8	4.8
与工作相关消费	31.4	30.3	1.1
设备用品和服务消费	6.4	8.0	-1.6
人力资本消费	8.7	12.9	-4.2
总消费	100	100	0.0

资料来源:根据2010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表4 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人均消费占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例

消费类别	农民工(1)(%)	城市居民(2)(%)	(1)-(2)(%)
食品消费	23.6	25.8	-2.2
与工作相关消费	13.8	16.0	-2.2
设备用品和服务消费	2.8	4.2	-1.4
人力资本消费	3.8	6.8	-3.0
总消费	44.1	52.9	-8.8

资料来源:根据2010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四、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

本部分将使用计量模型,考察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两个群体的消费水平、消费弹性和边际消费倾向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我们将要使用的,是得到广泛应用的最小二乘法回归模型。

(一)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消费弹性——分样本

我们的分析单位为农民工家庭与城市居民家庭,模型的因变量为家庭年人均消费数额。收入是影响消费的最重要因素,首先被包括在自变量中;家庭成员社会保障覆盖状况也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也被包括在自变量中。此外,自变量还包括家庭规模、家庭成员年龄构成变量、户主个人特征变量以及城市虚拟变量。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lnconpc = \alpha + \beta \lnincpc + \psi ssp + \gamma hhsz + \eta pold + \lambda HEAD + \phi CITY + u \quad (1)$$

其中, \lnconpc 是指家庭年人均消费的对数, \lnincpc 是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对数, \lnincpc

的系数 β 即为消费弹性(或称消费的收入弹性), ssp 是指家庭成员养老保险覆盖比例, $hhsz$ 是指家庭规模, $pold$ 是指家庭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 $HEAD$ 是一组影响消费的户主个人特征变量(包括户主性别、年龄和受教育年限), $CITY$ 是一组城市虚拟变量(参照组为上海), u 是随机误差项。模型中所用自变量见表 5。

收入是消费最基本的决定因素,考察消费的回归中需要加入反映收入水平的变量。我们在回归中加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以观察农民工家庭与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对消费的影响。收入对消费的正向影响,已经被诸多研究证实。我们有充足的理由预期,收入水平对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社会保障覆盖对家庭消费也有影响。我们在回归中加入家庭 16 岁及以上人口中被养老保险覆盖的人口比例,以观察社会保障覆盖对消费的影响。不过,社会保障覆盖对家庭当前消费的影响可能是双向的。一方面,被社会保障覆盖的人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更加稳定,从而可能增加当前消费;另一方面,社会保障支出会减少当前的可支配收入,从而可能减少消费。

有关家庭规模和家庭成员年龄结构的变

表 5 模型中所用自变量解释

自变量	类型	含义
人均可支配收入	连续变量	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养老保险覆盖比例	连续变量	16岁及以上人口中被养老保险覆盖的人口比例
家庭规模	连续变量	家庭常住人口数
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	连续变量	65岁及以上人口占家庭总人口比例
户主为女性	虚拟变量	户主为女性=1 户主为男性=0
户主年龄	连续变量	户主的周岁年龄
户主受教育年限	连续变量	户主的受教育年限
武汉	虚拟变量	武汉=1 其他=0
沈阳	虚拟变量	沈阳=1 其他=0
福州	虚拟变量	福州=1 其他=0
西安	虚拟变量	西安=1 其他=0
广州	虚拟变量	广州=1 其他=0

量,也可能影响家庭消费。回归方程中放入家庭规模变量,是为了控制家庭消费的规模经济效应。回归方程中放入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是为了控制其对某些消费项目的影响。例如,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越高,家庭的人均医疗保健消费可能越多,而教育消费可能越少。

回归方程中加入一组可能影响农民工家庭消费的户主个人特征变量,包括户主性别、年龄和受教育年限。这些均为户主的重要个人特征,可能影响其消费决策。例如,户主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其消费水平可能越高。最后,回归方程中放入一组城市虚拟变量,分别为武汉、沈阳、福州、西安与广州,以上海为参照组,旨在控制与地区相关的影响家庭消费的因素,如价格水平等。

表6是模型中所使用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农民工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559元,城市居民家庭为20995元,前者比后者低6.8%。农民工的养老保险覆盖比例为11%,远低于城市居民的70%。农民工的平均家庭规模为2.29,城市居民为2.89。对于农民工而言,很多家庭成员未随同一起迁移到城市,而是留守农村老家或者迁移到其他地方务工生活。因此,农民工的平均家庭规模更小是容易理解的现象。^⑨ 农民工家庭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仅为1%,城市居民达到16%。已有研究发现,年龄越大的农村人口外出

的概率越低(都阳和王美艳,2010)。因此,农民工家庭的人口年龄构成相比城市居民更加年轻也就成为必然。

农民工家庭中,户主为女性的家庭比例为33%,与城市居民家庭基本相当。农民工家庭户主的平均年龄仅为35岁,远低于城市居民。这与农民工家庭人口年龄构成更加年轻相关联。从受教育水平看,农民工家庭户主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7年,相当于略低于高中一年级;城市居民家庭户主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1.1年,相当于略高于高中二年级。农民工家庭户主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比城市居民家庭少了1.4年。

表7为农民工家庭与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消费的回归结果。从前面的分析我们看到,食品消费不论对农民工还是对城市居民而言,都是消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消费中占50%左右的比例。该表对人均总消费与人均食品消费分别进行了回归。回归模型的解释力较强, R^2 均在20%以上。自变量的回归结果比较符合我们的预期。

方程的因变量对人均消费的自然对数,人均可支配收入自然对数的系数,实际上即为消费的收入弹性。例如,对农民工总消费而言,其消费弹性为0.247,这意味着,农民工收入每增长1%,就会有0.247%用于消费;对农民工食品消费而言,其收入弹性为0.189,这意味着,农民工收入每增长1%,就会有0.189%用于食品消费。对农民工与城市居民而言,总消费的收入弹性和食品消费的收入弹性均显著为正。

养老保险覆盖比例对农民工的总消费和食品消费均为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城市居民消费无显著影响。这表明,养老保险具有促进农民工消费的作用。这与已有文献关于社会保障促进消费的结论是一致的(Feldstein, 1974; Munnell, 1974)。由此来看,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是促进农民工消费的重要途径。

家庭规模对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人均总消

表6 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特征的描述性统计

自变量	农民工	城市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19559	20995
养老保险覆盖比例	0.11	0.70
家庭规模(人)	2.29	2.89
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	0.01	0.16
户主为女性比例	0.33	0.31
户主年龄(岁)	35	52
户主受教育年限(年)	9.7	11.1

资料来源:根据2010年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表7 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消费弹性(分样本)

因变量:人均消费的对数	总消费		食品消费	
	农民工	城市居民	农民工	城市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对数	0.247*** (10.21)	0.279*** (18.35)	0.189*** (8.55)	0.201*** (14.29)
养老保险覆盖比例	0.109*** (2.89)	0.020 (0.91)	0.078* (1.81)	0.002 (0.09)
家庭规模	-0.033*** (3.01)	-0.087*** (11.74)	-0.053*** (4.64)	-0.124*** (16.17)
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	0.149 (0.81)	0.037 (1.09)	-0.094 (0.72)	0.045 (1.30)
户主为女性	0.048** (2.05)	0.045*** (2.84)	-0.006 (0.23)	0.031* (1.85)
户主年龄	-0.004*** (3.60)	-0.002*** (2.86)	0.001 (0.63)	-0.000 (0.17)
户主受教育年限	0.031*** (7.97)	0.028*** (11.47)	0.025*** (6.00)	0.018*** (6.99)
武汉	-0.246*** (6.74)	-0.157*** (6.53)	-0.402*** (10.23)	-0.346*** (12.69)
沈阳	-0.149*** (3.92)	-0.257*** (10.71)	-0.191*** (5.39)	-0.288*** (11.45)
福州	0.118*** (3.17)	0.142*** (5.44)	0.092** (2.46)	0.156*** (6.14)
西安	-0.182*** (4.43)	-0.155*** (5.84)	-0.369*** (9.04)	-0.352*** (12.41)
广州	0.048 (1.24)	0.049 (2.06)**	-0.028 (0.72)	-0.079 (3.12)***
常数项	6.515*** (25.49)	6.559*** (42.49)	6.507*** (26.86)	6.852*** (47.74)
R ²	0.29	0.36	0.23	0.31
观察值个数	2428	4148	2428	4148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里的数值为t值的绝对值。

资料来源:根据2010年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费和食品消费的影响均显著为负,表明家庭规模越大,人均总消费和食品消费越少。换句话说,家庭规模对总消费和食品消费均具有规模经济效应。例如,对农民工总消费而言,家庭规模系数为-0.033,这意味着,家庭规模每增加1人,人均总消费减少3.3%;对农民工食品消费而言,家庭规模系数为-0.053,这意味着,家庭规模每增加1人,人均食品消费减少5.3%。

户主性别对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人均总消费影响均显著为正。这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户主为女性的家庭的人均总消费更多。户主年龄对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总消费为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户主年龄越大,人均总消费越少。但户主年龄并不影响食品消费。户主受教育年限对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总消费和食品消费均为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

的情况下,户主受教育年限越长,家庭人均总消费和人均食品消费越多。由此,提高受教育水平是促进消费的重要途径。

(二)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消费弹性——混合样本

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由于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相比有着不同的特征,其消费观与消费行为可能与城市居民有着较大差异。为了考察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是否存在差异,我们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样本混合在一起,将农民工设为虚拟变量(M),考察两个群体的消费水平是否存在差异。模型设定如下:

$$\ln conpc = \alpha + \sigma M + \beta \ln incpc + \psi ssp + \gamma hhsz + \eta pold + \lambda HEAD + \phi CITY + u \quad (2)$$

再进一步,为了考察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消费收入弹性是否存在差异,我们在模型(2)中加入农民工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对数的交叉项($M * \ln incpc$),设定新的模型(3)。如果交叉项的系数 ω 显著,表明农民工的消费收入弹性与城市居民存在差异。系数 ω 显著为正意味着,农民工的消费收入弹性高于城市居民;系数 ω 显著为负则意味着,农民工的消费收入弹性低于城市居民。

$$\ln conpc = \alpha + \sigma M + \beta \ln incpc + \omega M * \ln incpc + \psi ssp + \gamma hhsz + \eta pold + \lambda HEAD + \phi CITY + u \quad (3)$$

表8为模型(2)和模型(3)的回归结果。回归模型使用的是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混合样本,并且对人均总消费和人均食品消费分别进行了回归。回归模型的解释力较强,而且自变量的回归结果比较符合我们的预期。

在模型(2)中,农民工虚拟变量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变量。不论对总消费还是对食品消费而言,农民工虚拟变量均显著为负,这表明,与城市居民相比,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农民工的人均总消费和人均食品消费都更少。农民工的人均总消费比城市居民低24.4%,人均食品消费比城市居民低14.5%。

在模型(3)中,农民工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交叉项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变量。如果交叉项显著,则表明农民工的消费弹性与城市居民存在差异。回归结果显示,不论对总消费还是对食品消费而言,交叉项均不显著。这表明,农民工的消费弹性与城市居民没有差异。

(三)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分样本

前面两部分讨论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消费收入弹性。此外,我们也希望了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将模型(1)中的因变量由人均消费的自然对数替换为人均消费原值,其中的自变量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自然对数也替换为原值,其他变量保持不变,形成模型(4),则模型(4)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系数 β 即为边际消费倾向:

$$conpc = \alpha + \beta incpc + \psi ssp + \gamma hhsz + \eta pold + \lambda HEAD + \phi CITY + u \quad (4)$$

利用模型(4),我们对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家庭分别进行了回归(表9)。回归结果显示,模型的解释力较强,而且自变量的回归结果基本符合预期。我们重点关注人均可支配收入这一变量,其系数即为边际消费倾向。回归模型中其他自变量的结果,在此不做详细讨论。

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总消费和食品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均显著为正。对农民工总消费而言,其边际消费倾向为0.161,这意味着,农民工收入每增加1元,就会有0.161元用于消费;对农民工食品消费而言,其边际消费倾向为0.065,这意味着,农民工收入每增加1元,就会有0.065元用于食品消费。对城市居民总消费而言,其边际消费倾向为0.102,这意味着,城市居民收入每增加1元,就会有0.102元用于消费;对城市居民食品消费而言,其边际消费倾向为0.024,这意味着,城市居民收入每增加1元,就会有0.024元用于食品消费。

(四)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

表8 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消费弹性(混合样本)

因变量:人均消费的对数	模型(2)		模型(3)	
	总消费	食品消费	总消费	食品消费
农民工	-0.244*** (12.47)	-0.145*** (7.14)	0.106 (0.45)	-0.000 (0.00)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对数	0.266*** (19.93)	0.195*** (16.03)	0.281*** (19.29)	0.201*** (14.94)
交叉项			-0.036 (1.48)	-0.015 (0.67)
养老保险覆盖比例	0.046** (2.50)	0.023 (1.21)	0.047** (2.55)	0.024 (1.24)
家庭规模	-0.064*** (10.37)	-0.094*** (14.50)	-0.065*** (10.41)	-0.094*** (14.49)
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	0.076** (2.41)	0.058* (1.80)	0.072** (2.25)	0.056* (1.73)
户主为女性	0.047*** (3.58)	0.015 (1.01)	0.047*** (3.57)	0.014 (1.00)
户主年龄	-0.003*** (4.25)	0.000 (0.58)	-0.003*** (4.32)	0.000 (0.56)
户主的受教育年限	0.030*** (14.49)	0.021*** (9.52)	0.029*** (14.29)	0.020*** (9.39)
武汉	-0.197*** (9.62)	-0.376*** (16.49)	-0.197*** (9.67)	-0.376*** (16.53)
沈阳	-0.219*** (10.51)	-0.255*** (12.33)	-0.216*** (10.52)	-0.254*** (12.39)
福州	0.135*** (6.33)	0.130*** (6.25)	0.137*** (6.49)	0.131*** (6.34)
西安	-0.161*** (7.08)	-0.354*** (15.04)	-0.160*** (7.10)	-0.353*** (15.10)
广州	0.051** (2.51)	-0.059*** (2.84)	0.052** (2.57)	-0.059*** (2.82)
常数项	6.605*** (47.86)	6.748*** (52.13)	6.473*** (44.05)	6.694*** (48.73)
R ²	0.36	0.28	0.36	0.28
观察值个数	6576	6576	6576	6576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里的数值为t值的绝对值。

资料来源:根据2010年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混合样本

如考察消费弹性时相同,在讨论边际消费倾向时,我们也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样本混合

在一起,将农民工设为虚拟变量(M),考察两个群体的消费水平是否存在差异。模型设定如下:

$$conpc = \alpha + \sigma M + \beta incpc + \psi ssp + \gamma hhsz +$$

表9 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分样本)

因变量:人均消费	总消费		食品消费	
	农民工	城市居民	农民工	城市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0.161*** (5.64)	0.102*** (3.23)	0.065*** (4.16)	0.024*** (2.75)
养老保险覆盖比例	1214.369 (1.50)	71.024 (0.18)	774.982 (1.54)	40.777 (0.18)
家庭规模	-426.084** (2.54)	-1314.904*** (8.37)	-406.435*** (5.23)	-945.193*** (9.88)
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	1556.470 (1.18)	935.788 (1.55)	-558.701 (1.01)	404.275 (1.32)
户主为女性	282.475 (0.75)	368.961 (1.34)	-19.287 (0.12)	-52.010 (0.37)
户主年龄	-71.971*** (4.14)	-24.857* (1.84)	-13.790 (1.56)	-0.897 (0.11)
户主受教育年限	221.350*** (4.15)	390.871*** (7.09)	96.130*** (3.32)	135.229*** (6.26)
武汉	-1538.870** (2.54)	-1540.797*** (3.45)	-1237.842*** (7.02)	-1720.519*** (8.44)
沈阳	-1044.946* (1.84)	-3023.968*** (6.30)	-643.354*** (3.21)	-1863.383*** (8.38)
福州	1308.406* (1.95)	1980.508*** (3.44)	785.522*** (3.34)	1134.463*** (3.14)
西安	-495.880 (0.71)	-1947.297*** (3.62)	-818.981** (2.14)	-1917.168*** (7.18)
广州	55.076 (0.07)	784.344* (1.66)	169.007 (0.42)	-423.434** (2.02)
常数项	7424.812*** (5.38)	10555.847*** (9.29)	4425.996*** (5.53)	7309.175*** (11.54)
R ²	0.19	0.22	0.19	0.14
观察值个数	2428	4148	2428	4148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里的数值为t值的绝对值。

资料来源:根据2010年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eta_{pold} + \lambda HEAD + \phi CITY + u \quad (5)$$

再进一步,为了考察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是否存在差异,我们在模型(5)中加入农民工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交叉项($M*incpc$),设定新的模型(6)。如果交叉项的系数 ω 显著,说明农民工的边际消费倾向与城市居民存在差异。系数 ω 显著为正意味着,农民工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城市居民;系数 ω 显著为负则

意味着,农民工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城市居民。

$$conpc = \alpha + \sigma M + \beta incpc + \omega M*incpc + \psi ssp + \gamma hhsz + \eta_{pold} + \lambda HEAD + \phi CITY + u \quad (6)$$

表10为模型(5)和模型(6)的回归结果。回归模型使用的是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混合样本,并且对人均总消费和人均食品消费分别进行了回归。回归模型的解释力较强,而且自变量的回归结果基本符合我们的预期。

表 10 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混合样本)

因变量:人均消费	模型(5)		模型(6)	
	总消费	食品消费	总消费	食品消费
农民工	-2500.342*** (7.32)	-750.115*** (3.87)	-3473.584*** (4.38)	-1537.236*** (5.04)
人均可支配收入	0.119*** (4.16)	0.035*** (3.36)	0.107*** (3.32)	0.026*** (2.85)
交叉项			0.044 (1.12)	0.036** (2.14)
养老保险覆盖比例	446.476 (1.24)	331.065 (1.52)	352.477 (1.01)	255.042 (1.26)
家庭规模	-964.451*** (7.73)	-738.352*** (11.20)	-945.096*** (8.05)	-722.699*** (11.28)
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	1316.799** (2.35)	521.165* (1.93)	1413.048** (2.55)	599.008** (2.22)
户主为女性	237.770 (1.08)	-108.936 (0.96)	262.247 (1.19)	-89.140 (0.79)
户主年龄	-39.120*** (3.68)	-3.900 (0.63)	-39.296*** (3.71)	-4.043 (0.66)
户主受教育年限	333.261*** (7.81)	119.996*** (6.34)	340.017*** (7.95)	125.460*** (7.01)
武汉	-1694.999*** (4.23)	-1627.965*** (10.44)	-1640.776*** (4.43)	-1584.112*** (10.83)
沈阳	-2353.339*** (5.90)	-1434.805*** (8.19)	-2355.219*** (6.16)	-1436.326*** (8.69)
福州	1732.666*** (3.94)	1022.440*** (4.31)	1722.256*** (3.96)	1014.021*** (4.33)
西安	-1408.432*** (3.03)	-1508.502*** (6.29)	-1372.558*** (3.11)	-1479.489*** (6.32)
广州	546.883 (1.36)	-185.479 (1.02)	511.914 (1.31)	-213.760 (1.20)
常数项	10162.353*** (9.91)	6397.481*** (11.39)	10338.443*** (10.01)	6539.897*** (12.17)
R ²	0.22	0.15	0.22	0.16
观察值个数	6576	6576	6576	6576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里的数值为t值的绝对值。

资料来源:根据2010年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在模型(5)中,农民工虚拟变量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变量。不论对总消费还是对食品消费而言,农民工虚拟变量均显著为负。这表明,与城市居民相比,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农民工

的人均总消费和人均食品消费都更少。

在模型(6)中,农民工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交叉项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变量。如果交叉项显著,则表明农民工的边际消费倾向与城市居民

存在差异。回归结果显示,在总消费模型中,交叉项不显著;在食品消费模型中,交叉项的系数为0.036而且显著。这表明,农民工的边际总消费倾向与城市居民没有差异,边际食品消费倾向高于城市居民。

五、农民工的消费潜力——以城市居民为参照系

前文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各类消费均低于城市居民,但是,在控制住其他因素的条件下,农民工的边际总消费倾向与城市居民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边际食品消费倾向还略高于城市居民。与此同时,近年来农民工收入迅速增长,因此,我们有充足的理由预期,如果农民工转变为城市居民,实现身份转换,其消费水平将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我们假设,农民工实现身份转换后,其消费

模式将随之转换为城市居民的消费模式。根据城市居民消费回归模型,我们可以计算出在该种状况下农民工的消费水平(表11)。如果农民工的禀赋特征保持不变,但按照城市居民的模式进行消费,其人均总消费将变得与城市居民相当。其中,食品消费、设备用品和服务消费与城市居民非常接近;与工作相关消费比城市居民高出9.1%;然而,人力资本消费仍远远低于城市居民,低出28.4%。

如果农民工按照城市居民的模式进行消费,其消费与自身实际水平相比,将实现较大幅度增长(表12)。农民工年人均总消费将提高2333元,提高幅度为27%。食品消费的提高幅度为16.7%,是各项消费中提高幅度最小的;接下来是与工作相关消费和人力资本消费,其提高幅度分别达到35.7%和37.3%;设备用品和服务消费的提高幅度达到56.7%。

2009年国家统计局对全国31个省区农民工

表 11 农民工消费潜力估计

消费类别	农民工估计数(1)(元)	城市居民(2)(元)	(1)-(2)(元)	(1)-(2)/(2)*100(%)
食品消费	5393	5416	-23	-0.4
与工作相关消费	3674	3367	307	9.1
设备用品和服务消费	868	888	-20	-2.3
人力资本消费	1026	1433	-407	-28.4
总消费	10960	11104	-144	-1.3

注:农民工估计数是指假定按照城市居民的模式进行消费的情况下农民工年人均消费的数量。

资料来源:根据2010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表 12 农民工的年人均消费水平:实际的与估计的

消费类别	农民工估计数(1)(元)	农民工实际数(2)(元)	(1)-(2)(元)	(1)-(2)/(2)*100(%)
食品消费	5393	4620	773	16.7
与工作相关消费	3674	2707	967	35.7
设备用品和服务消费	868	554	314	56.7
人力资本消费	1026	747	279	37.3
总消费	10960	8627	2333	27.0

注:农民工估计数是指假定按照城市居民的模式进行消费的情况下农民工年人均消费的数量,农民工实际数是指农民工的实际年人均消费数量。

资料来源:根据2010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的监测调查显示,外出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外出农民工数量达到1.45亿(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14)。按年人均消费8627元计算,农民工总消费为12509亿元。如果按照城市居民的模式进行消费,农民工年人均消费将增加2333元,农民工群体的总消费将增加3383亿元,达到15892亿元。2009年GDP总量为340903亿元,据此估计,农民工消费占到GDP总量的4.7%。

以上对农民工消费潜力的估计,是在假定农民工禀赋特征保持不变的前提下作出的。前文回归表明,收入水平、养老保险覆盖水平和受教育水平等,都是影响农民工消费水平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农民工收入在持续而迅速地提高,养老保险覆盖面不断扩大,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如果将农民工禀赋特征的变化一并考虑在内,农民工的消费潜力将更大。

六、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研究利用2010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描述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分析了两个群体的消费弹性和边际消费倾向,考察了其消费弹性和边际消费倾向的差异。在回归模型的基础上,本研究估计了如果农民工转换为城市居民身份而禀赋特征保持不变,农民工消费将会发生多大幅度的增长。本部分总结文章的主要结论,并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研究表明,农民工消费水平低于城市居民,年人均总消费比城市居民低22%。对农民工与城市居民而言,总消费弹性和食品消费弹性均显著为正,两个群体的总消费弹性和食品消费弹性均无显著差异。养老保险覆盖比例对农民工的总消费和食品消费均为显著的正向影响;总消费和食品消费对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均具有家庭规模经济效应;户主受教育年限对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总消费和食品消费均为显著的正

向影响。对农民工与城市居民而言,总消费和食品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同样均显著为正;农民工的边际总消费倾向与城市居民没有显著差异,边际食品消费倾向高于城市居民。

如果农民工转换为城市居民身份,按照城市居民的消费模式进行消费,但其禀赋特征保持不变,其人均总消费将大幅度增长27%,与城市居民消费水平基本相当。而且,我们有充足的理由预期,农民工的消费潜力将远不止于此。这是因为,回归分析告诉我们,收入水平、养老保险覆盖水平和受教育水平等因素,均对农民工消费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随着城市化的进行,农民工这些方面的禀赋特征正在不断并将持续得到改善。消费模式的改变和禀赋特征的改善两者合起来,足以使农民工成为一个巨大的新兴消费群体,在提高内需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因此,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不仅仅是城市化本身面临的重要任务和挑战,也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近年来,中国在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方面,作出了一系列努力(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10;蔡昉,2011)。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和《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相继发布,两个文件都对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行了深刻阐述。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步伐,是挖掘农民工消费潜力的关键。

注释:

①该数字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的相关数据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其统计数字与国家统计局基本相当。根据该数据库,2013年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和居民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48.2%和34.1%。

②该数字来源于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

③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7000万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工春节前提前返乡,其中有1200万是由于与金融危机有关的因素返乡的(盛来运,2010)。这是周期性失业影响农民工的典型例证之一。

④大多数农民工未被社会保障体系覆盖,目前外出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比例均不到20%(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14)。

⑤若干研究表明,社会保障覆盖能够促进消费(Feldstein, 1974; Munnell, 1974; 张继海, 2008)。反之,未被社会保障覆盖或者社会保障水平低,则会造成对未来的不稳定预期,从而制约消费。

⑥第二部分将对这些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⑦第三部分将对该数据的基本情况和使用该数据的优势进行详细介绍。

⑧为了保持与城市居民的可比性,此处农民工收入按可支配收入口径计算。

⑨本研究按常住人口口径对家庭规模进行统计。

参考文献:

①蔡昉:《农民工市民化与新消费者的成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1年第3期。

②蔡昉、都阳:《工资增长、工资趋同与刘易斯转折点》,《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9期。

③曹广忠、李凯、刘涛:《中国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与完全城镇化——基于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中国地理学会2012年学术年会学术论文集,2012年。

④都阳、王美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新估计及其含义》,《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⑤樊纲、郭万达等:《农民工早退:理论、实证与政策》,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年版。

⑥国家统计局农村司:《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14)》,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年版。

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农民工市民化对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研究》

2010年第6期。

⑧孔祥利、粟娟:《我国农民工消费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28省区1860个样本调查数据》,《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⑨李实:《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的农民工状况》,《劳动经济研究》2013年第1期。

⑩盛来运:《金融危机中农民工就业面临新挑战》,载都阳主编:《城乡福利一体化:探索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⑪粟娟、孔祥利:《中国农民工消费结构特征及市民化趋势分析——基于全国28省1249份有效样本数据检验》,《统计与信息论坛》2012年第12期。

⑫王美艳:《农民工消费水平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载蔡昉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4——从人口红利到制度红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⑬“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结构和特点》,载蔡昉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2——“十二五”时期的挑战:人口、就业和收入分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⑭张继海:《社会保障对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和储蓄行为影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发展报告2010:促进人的发展的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⑯Feldstein, M., Social security, induced retirement and aggregate capital accumul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82, No.5, 1974.

⑰Munnell, A., *The Effect Of Social Security On Personal Savings*. Cambridge, Mass.: Ballinger, 1974.

⑱Song, L., Wu, J. and Zhang, Y., Urbaniz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nd expansion of domestic demand.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Vol.31, No.3, 2010.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责任编辑 徐敬东